

“科举流动”争议中的标准和条件问题

林上洪

(宁波大学 高教研究室,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科举考试制度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 研究者争议不断, 形成“流动派”、“非流动派”和“中间派”三种科举流动观点。二元社会分层思维和流动参照点选择差异是造成各方分歧的关键, 这是科举流动标准设定问题, 也是科举流动条件辨析的问题。从“分层流动”视角考察, 科举流动是一个代际渐进的过程, 教育是科举流动的根本条件。

关键词: 科举制度; 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 教育条件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4-0109-06

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科举造成较大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事实还是错误印象, 历来存在不同看法, 中外学术界曾作过大量的研究, 形成了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1][236]} 随着研究和分析的深入, “科举流动”的历史面貌渐渐清晰, 科举制度“所筑的路, 宽阔到什么程度”^{[2][440]} 已不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 而是一个科举流动标准设定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如何对科举流动条件进行辨析的问题。

一、科举流动观点概述

历朝官员履历、乡会试同年录、同年齿录和硃卷履历等文献资料, 记录了丰富的科举考试中式者的家世背景信息, 为量化研究提供了方便。据中外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类, 科举流动观点大致可以分为“流动派、非流动派以及中间派”。^{[3][63]}

(一) 流动派观点

流动派认为科举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 以费孝通、柯睿格(E.A.Kracke)、何炳棣(Ping-Ti Ho)和钱茂伟等人的研究影响较大。

20世纪40年代, 费孝通与潘光旦合作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他们对清代康熙至宣统年间915份进士、举人和贡生硃卷履历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卷主先辈之功名分布。其所界定的社会流动是家世上五代没有功名的卷主从

白衣而获得功名身份, “如果他们的祖或父已经有功名的, 则他们的中式不过是维持社会地位, 并不能认为在社会阶梯上上升了一步”。统计结果是, 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只有122人, 在915人中占13.33%。这一比例被他们认为是“科举所开放给平民上升的道路的宽度”。^{[2][450]}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柯睿格发表《科举考试中的门第与能力》一文。通过对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题名小录》的统计, 得出在可考家庭背景的279名进士中, 上三代祖先全无做官者157人, 占56.3%; 通过对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 得出家庭背景可考的572名进士中, 来自平民家庭者331人, 占57.9%。他认为科举是有才能者进入官员阶层的重要途径, 并因此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4]

1962年何炳棣在美国出版英文著作《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 关于社会流动》(英文原名 *The Ladder for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也译作《明清社会史论》)。作者对明清约3.8万名科举功名获得者的家世资料进行统计, 得出明清进士出身平民的比例为42.7%。^[5] 他认为, “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是在相当程度之内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的”。^{[6][28]}

钱茂伟在《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 把明代社会流动分为“由

收稿日期: 2012-02-27

作者简介: 林上洪(1972-), 男, 江西上饶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和考试制度。E-mail: jx035@sina.com

民而士的流动”和“由士而官的流动”两个层面。^{[7]137}考察明代科举流动状况时,钱茂伟研究了宁波天一阁所藏明代科举文献,比何炳棣更为全面地对明代进士家庭成分进行统计,修正了何氏的某些结论,认为明代进士出身于“平民之家的比例还要高些”。^{[7]141}

(二) 非流动派观点

非流动派用实证研究否定流动派的观点,认为科举并未造成多大的社会流动,以海姆斯(Robert P. Hymes)、哈韦尔(Robert A. Hartwell)和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等人为代表。

1986年,海姆斯在《政治家与士大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英文原名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书中,对柯睿格和何炳棣的科举流动观进行了反驳,认为考察科举流动,不能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为依据,而应将母系、旁系乃至五服以外的亲属家世,以及庇荫等因素都考虑进去。他得出结论,出身名门望族是应举并及第的一个条件。从抚州地区来看,两宋科举制度下社会阶层流动率基本上等于零。^[8]

哈韦尔在《750年至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变迁》一文中,集中研究宋代官员的传记资料后认为,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大。宋代朝廷经常由数个或数十个大家族所垄断,依靠家族势力及彼此互相通婚长期保其势力,可长达十余代之久,科举出身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12]41} 艾尔曼后来也采信了海姆斯的观点,认为柯睿格与何炳棣所言科举促成的社会流动率过高,低估了家族、婚戚对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重生产’而已”。^{[6]26}

(三) 中间派观点

所谓中间派的观点,是介乎“流动与非流动之间”的弹性调和,认为“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和结果既没有流动派所说的那么大,也没有非流动派所说的那么小”。^{[11]242} 中间派观点以张仲礼、贾志扬(John W. Chaffee)、李弘祺和刘海峰等人影响较大。

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研究》一书中,分析了地方史料中收集的5473份绅士传记,其中有明确家世记录者2146份,统计得出有35%的“新

进者”来自普通家庭。^{[9]186-187} 他所定义的绅士包括生员和异途捐纳功名的“下层绅士”,其比例远高于“上层绅士”,如果单从出身于平民的上层绅士来看,流动比例会小很多。张氏认为财富、家族势力和家庭背景是升进的有利因素,但对于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利用才智和勤勉也有机会进入绅士阶层。

美国学者贾志扬认为,尽管科举社会中的知识和婚姻关联紧密,考试之外的因素诸如家世和婚姻等对社会结构变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考试仍是决定精英社会变动的关键性因素。^[10] 李弘祺一方面认为科举是平民阶层升进的唯一可靠的路,另一方面又认为“直接受科举制影响的人数确实很少,因此考试制度无助于产生非常重要的社会流动”。^{[11]263}

在《科举学导论》一书中,刘海峰认为科举流动的实际情况,“大概就在流动派与非流动派的观点之间”,已获科第的家庭可以通过科举保持地位,下层士人也存在通过科举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传统社会很少有机会能够让人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自身的命运,读书应举便是难得的一个途径。“不管科举造成的社会阶层流动到底有多大,有一部分社会下层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社会上层总是不争的事实”。^{[12]44-245} 看来,这位“中间派”代表人物,更像是中立的流动派。

二、科举流动的标准问题

对于科举制度是否产生流动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流动,分歧的关键在于各派的流动标准不一致。流动派代表何炳棣所分析的流动是从“生员及生员以下”到“中高级科举功名”的升进;非流动派代表海姆斯认为高级功名获得者的家庭、家族或姻戚如果有任何可能的声望地位或财富,就不能算作科举产生的社会流动,换言之,他的流动标准是从“无任何家世背景和财富条件者”到“科举高级功名”;张仲礼的流动标准较为宽泛,从“平民”到“生员(含异途捐监等)及生员以上”的升进都属于社会流动,但他对科举流动功能持谨慎的保守态度。各方的论点,“貌似冲突,实无太大的抵牾,且可相互补充,基本统一”,如沈登苗所说,“如果我们把是否拥有财富和生员功名分别看成科举社会上下对流中的经济与文化各自的一个台阶,承认事实上存在的

‘分层流动’，那么，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激烈的学术争鸣就可以基本调和了”。^[12]

（一）流动的分类涵义

我们借用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伯克（Peter Burke）的观点来阐述不同涵义的“流动”。伯克认为历史学家讨论“社会流动”问题应该熟悉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些区分。“其中至少有三个区分可以被史学研究所利用。第一个是沿社会阶梯向上的运动和向下的运动之间的区分，而向下流动的研究一直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第二个区分是个人一生中的流动和延续好几代的流动之间的区分。第三个区分是个体流动和群体流动之间的区分。”^{[13]67}

伯克所说的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区分有利于全面认识科举制度的流动功能。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科举的向上流动功能，科举产生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证据是科举成功者的家世出身资料，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是高级功名获得者中的平民出身比例，虽然平民的标准并无统一。批评者指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人口基数相差甚远，即便按上五代出身统计得到的总体上“10.09%的举子来自布衣家庭”^{[3]178}的估计，稀释到庞大的平民人口总量中，上升的比例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平民阶层的上升机会仍然很小。但是，如果从已有功名的精英阶层的子弟没有获得与父辈相对应的功名的角度来反向考察，科举产生的代际向下流动的比例是显见的，尽管对此有过考察的李弘祺将它理解为“官僚队伍不稳定的一种表现”。^{[11]245}

伯克所说的第二个区分，实际上是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的区分。代内流动不是本研究中科举流动讨论的重点，因为我们所考察的对象是有文献资料记录的科举功名获得者，他们属于实现了代内流动的科举人物。代际流动的分歧较大，费孝通以科举人物的上五代家世出身为重点考察代际流动；何炳棣以上三代家世出身为重点来考察代际流动；张仲礼则把父辈或祖辈有绅士地位的绅士视为“继进者”，把父辈或祖辈没有绅士地位的绅士视为“新进者”，^{[9]177}也就是说，他是以上二代家世出身为重点来考察代际流动。而社会学中的“代际流动”是指同一家庭中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动。就上二代、上三代

乃至上五代进行综合考察的阶层流动，实际上包含了存在其中的数个延续的代际流动状况。

个体流动和群体流动之间的区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个体流动并不一定能代表群体流动。非流动派代表海姆斯，把同姓同乡都认为是同“族”，扩大了通常所认可的以五服之内为“族”的范围，且夸大了“族”的功能，忽略了族群内部分层的现实。何炳棣举自己家族的实例，说明家族中的上升流动者“经济上支持族人的能力实在是有限的、‘边缘’的”，认为“两宋以降，族对族人向上流动的功能是绝对不会大到海姆斯未明言、而几乎相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程度的”。^{[6]25}当然，海姆斯对“族”的关注并非毫无意义，他提醒我们注意单从父祖直系血缘考察家世出身有可能出现的误差。笔者统计过《清代硃卷集成》会试卷履历中的师承记录，1634名进士中999名曾有家族成员担任受业师，而在这类族亲受业师中，“堂伯叔”出现的频次最高，这说明家族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于描述科举人物的家世出身。

（二）科举时代的社会分层

伯克的建议涉及到“延续好几代的流动”，但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沈登苗已经意识到的“二元流动”和“分层流动”的区分，这既关系到社会分层标准问题，又关系到流动参照点选择问题。已有的科举流动研究大多是运用“二元流动”分析方法进行的，流动起点一般设定为“平民”身份，流动终点是有做官资格的科举“功名”身份。这种划分本身并不清晰，因为无功名身份者不一定是平民，有功名身份者不一定能做官。若从“分层流动”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则至少需要关注三个方面：其一，传统士、农、工、商的划分；其二，科举制度下“士”的功名层级；其三，“士”与“仕”的区别。

自从科举制度诞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获得了现实的根基，作为统治阶层后备队伍的“士”成为当然的四民之首。“士”与“农、工、商”三民的区别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也就是说，在科举功名可能带来收益的诱惑下脱离了物质生产劳动的读书人都可以算作“士”。从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认为“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实际上正是指从劳力者向劳心者的跃

迁”，“科举制强化了士与其他阶层之间的严格界限，同时模糊了农、工、商之间的界限”。^[14]人们的确有意无意中模糊了农、工、商的界限，习惯上把他们整体作为平民看待，也忽略了农、工、商各个群体内实然存在的阶层差别。显然，有田产的富户或地主不能等同于佃农，有手工作坊的工匠师傅不能等同于伙计杂工，有店铺的商贾不能等同于街头叫卖的小贩。

如果把“习举业者”都纳入广义的“士”的范畴，那么科举社会的“士”可以分为童生、生员、贡生、举人和进士五个层级。童生试是科举功名的第一道门槛，报名注册参加童生试者才算是童生。童生可以算是半只脚踏过门槛的人，只有愿意持续努力，双脚跨过门槛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此，他们是区别于普通平民的一个特殊阶层。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提到一句流传在他家乡安庆一带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佃户家庭中如果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童生，“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15]当然，大多数童生终生不能获得生员身份，他们一部分以儒为业，一部分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努力积攒财富，功名希望之光在他们的子辈中延续。

关于“士”与“仕”的区别，涉及分析科举人物家世出身时如何对待异途官职获得者和如何判断平民身份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仅以科举功名作为社会阶层地位的标志，就可能忽略了相当一部分军功、荫庇、捐纳等途径入仕或候选的官僚群体。据张仲礼分析，清代全国文官职位约2万个，“在太平天国前，‘正途’官员数对‘异途’官员数之比约二比一。太平天国后则为四比三”。另一方面，很多有科举功名身份的人物并没有官职。张仲礼统计了清代太平天国前后浙江嘉善地区“正途”绅士担任官职的比例，“进士一般总能授实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也能授职”，贡生和生员有时也能出仕，但比例很小。总体上，“‘正途’绅士步入仕途的约占5%”。^{[9]96-98}如此，从非官即民的涵义上说，何炳棣把生员归为平民一类来统计家世出身亦无不妥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官职“功名”比科举“功名”更能说明社会地位。我们理解的科举“功名”严格意义上属于科举“科名”，只有获

得官职才能表现其应有的价值。晚清重臣刘坤一的“两江总督”官职显然比其“县学生”的科举“功名”更能说明其身份地位。^[16]所以，考察科举人物家世出身的时候，无功名或低功名者的官职应该作为一项参考依据。

(三) 渐进的代际流动

从以上分析看出，对科举人物的家世出身进行“分层”考察，涉及的层次包括平民底层、平民上层、童生阶层、异途升进、生员、贡生、举人、进士、没有科名的官宦、有科名有官职者等多种类型的地位身份。异途升进者包括通过捐监、荫庇、军功等途径获得官职或议叙候选官职者，大多是七品以下的小官吏或其他无实缺的虚衔。如果从社会学“代际流动”的角度考察流动现象，只要任何两代之间存在阶层变化，都可以视为发生了向上或向下的流动，跨越的阶层越多，流动的幅度越大。对于社会底层而言，科举制度提供的向上流动空间显然很大；而对于社会上层而言，科举制度带来了更多向下流动的压力。

如果我们认可相邻阶层间的流动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就应该认识到以高级功名身份为终点的科举流动其实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底层平民的向上流动，其间还可能出现向上和向下流动的反复。除了经过社会大洗牌的改朝换代之初会集中出现大量跨越式上升流动现象，在社会稳定时期，上三代或上五代都没有功名的家世出身者获得进士功名比例很小。如沈登苗所说，“在科举社会，既没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鲜有一步登天的新贵。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科举社会的流动率，若从近距离看，犹如在地球上观察地球——它没有动；但从长时段看，如同在太空上望地球——它在不停地运转”。^[12]

的确，“任何一个分层的社会都不可能处于一种完全不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所有的孩子，儿子或是女儿，都享有（或者忍受）与他的父母一样的社会地位，是不太可能的”。^{[13]68}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确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17]当然，如果排除家族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影响，出身于世代底层平民家庭的子弟想要一步考中进士，实现最大幅度的升进，估计比登天还难。

三、科举流动的条件问题

科举流动条件与科举流动标准关系密切,二者常容易被混淆,简单区别的话,流动标准解答是否存在流动的问题,流动条件解答怎样才能实现流动的问题。流动条件的理解是流动标准设定的前提,关系到科举流动功能大小的判断。如果说科举流动标准是科举制度外部的讨论,属于社会流动的范畴,那么科举流动条件则是科举制度内部的讨论,是科举制内在规定性的反映。非流动派反驳流动派的理由是,流动是家世出身决定的,不是因为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少数平民升进者,非流动派认为这是由于姻戚或家族的声望地位或财富的作用。这种说法放在考察九品中正制的流动功能的语境中,也许是非常合适的,但以家族声望或财富来考察科举流动则多少有些偏颇,声望或财富既不能作为衡量流动幅度的标准,也不足以作为科举流动产生的条件。如果说财富能够产生由科举功名身份来判断的社会流动,那主要表现在异途捐纳低级功名方面,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流动的范畴。

科举制度有别于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选士的标准既不是孝廉品行也不是门阀族望,而是“考试”。“怀碟自进”的开放性和“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公平性是科举考试足以标榜的两大原则。宋代之后,科举选士制度进一步走向规范化、严密化和复杂化,一系列贡院规制、命题评卷程序和惩罚作弊措施的完善,保证了科举考试成绩能真实地反映应试者的水平。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贵族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都能跻身俸禄补缺等级”。^[18]也就是说,贵族地位不再是世袭,而是通过考试竞争获得,考试选士对打破僵化的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方面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考试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而教育又有助于考试的成功,由是,教育本身也成为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这是清楚不过的逻辑”。^[19]

科举流动的必要条件乃至根本条件是教育,所谓家世出身、家族声望和财富都不能成为科举流动的直接条件,唯有子代通过教育掌握了应对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才可能获得科举

成功,实现最光彩、最有仕途前景的上升流动。良好的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环境和专门从事教授工作的教师,除了少数家庭成员自相传授的情形外,教育师承是科举人物实现上升流动的最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寒的耕读人家或业儒家庭的子弟,可能比富户子弟有更好的教育条件,能获得更多的科举流动机会。

当我们把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流动条件时,有学者会提出异议,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条件和读书人的天赋条件。如果吃饭问题不能解决,那何谈教育?如果没有读书天赋,那怎么能够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沈登苗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在科举时代,有否真正的资格应试,主要取决于父、祖辈的经济条件;能否在场屋中胜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实力——经济实力与自身智力决定人们在科举道路上能走多远。”^[12]

表面上看,经济条件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条件只在解决温饱的限度内有意义,超过这个限度,财富多少并不起决定作用。或者我们把比较的对象都圈定在有经济条件的家庭,那经济条件还能成为最重要的条件吗?况且,科举文献中不乏节妇含辛茹苦课读子弟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条件是科举流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也不是最重要的条件。当然,良好的经济条件可以部分转化为最直接、最重要的教育条件,家庭和家族声望地位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教育资源的获得也有重要影响,相对优势是显见的。

关于禀赋条件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区别先天禀赋还是后天禀赋。先天禀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天赋,天赋超常者被称为天才或神童,他们在人群中的比例非常微小,就像千里马一样,可遇不可求,且有被埋没的危险。超常的后天禀赋往往也被人们视作天赋,而实际上更多是后天早期教育差异的表现。由此可知,排除极端经济条件和天赋差异,科举成功的机会最大程度上取决于获得教育的机会,也就是说,教育条件是科举流动的关键。

四、结论

综上,科举制度是否产生流动和流动率大小,是由预设的流动标准决定的,按照社会学代

际流动的标准来考察,科举制度的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功能都是显著的。科举流动条件是科举制度内在规定性的反映,对科举流动条件的认识事实上影响了人们对科举流动功能的判断。家世出身并不是科举流动的首要条件,科举流动是否产生由士子应对科举的知识体系和考试能力决定,教育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条件。

与科举社会各层级科举人物金字塔式的数量结构相对应,科举制度所筑的上升流动之路呈现由宽到窄的形态。这条上升流动之路并没有刻意设定平民出身或贵族出身应试者的流量比例,对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阶层,经济条件和家族声望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能间接呈现影响作用,但决定他们上升流动道路宽窄的,根本上只是“教育”这道阀门。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3] 郑若玲. 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4] KRACKE E A. Family V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7,10(2):103-123.
- [5]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92-125.
- [6]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7] 钱茂伟. 国家、科举与社会[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8] HYMES R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34-48.
- [9] 张仲礼. 中国绅士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0] CHAFFEE J W.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87-188.
- [11] 李弘祺. 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 245.
- [12] 沈登苗. 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J]. *教育与考试*, 2008(2): 40-43.
- [13] 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 姚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4] 纪莺莺.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J]. *社会*, 2006(1): 190-208.
- [15]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168.
- [16] 顾廷龙. 清代硃卷集成: 第46册[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92: 7.
- [17] 罗志田.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213.
- [18]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62.
- [19] 周作宇. 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5): 85-90.

On the Standard and Condi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Social Mobility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IN Shang-hong

(Office of Hig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mperial system promoted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ers have had continuous controversial viewpoints: “the positive”, “the negative” and “the neutral”. The crux of the controversy rest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ualistic thinking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social mobility.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tandards and conditions for soci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ified mobil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al mobility is an intergenerational process, and education is its essential condition.

Keyword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condition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张文鸯)